

# 北朝碑志所见北方少数民族之汉化

魏宏利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古之逐步汉化是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而其进程前后持续三个多世纪, 则具体过程之困难概可想见。本文通过北朝碑志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 分别从族源出处、文武转化、人际伦理等方面揭示出少数民族在接受汉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以及其内在的矛盾与冲突。文章最后指出, 尽管面临种种矛盾与问题, 但总的历史趋势却是向着民族大融合的方向发展, 这种大融合为后来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碑志; 北朝; 鲜卑族; 汉化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2X(2006)03-0100-05

**收稿日期:** 2006-01-04

**作者简介:** 魏宏利(1975—), 男, 陕西宝鸡人, 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古之逐步汉化是中国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 其在政治、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已为历来的研究者所认可。但汉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自公元三世纪至公元六世纪, 前后三百余年始告初步完成, 则其困难程度概可想见。本文尝试通过北朝的碑志材料对这一历史进程加以考察, 以显示整个事件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并为中古民族交流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 一、材料运用的原则与方法

碑志的著录与研究在传统学术中属于金石学的范畴, 滥觞于宋而极盛于清。但传统研究对碑志材料的使用多限于证史一途, 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 但研究范围与视角的狭窄是明显的。二十世纪以来, 随着西学传入, 情况开始发生改变, 汤用彤氏对于北朝造像材料价值的论述, 马长寿、毛汉光等人的相关研究都可作为这种新变化的明证。本文对于碑志的运用亦禀此精神, 简言之, 即不致力于具体名物制度之考证, 而试图通过相关材料对当时的社会真实心态进行考察研究, 以揭示在具体汉化过程中北方少数民族所面临的矛盾与冲突。

与此相关的是碑志的“信值”问题。关于这

个问题, 宋代的金石大家欧阳修说:“余于碑志, 惟取其世次、官寿、乡里为正。至于功过、善恶, 未尝为据者。”<sup>[1]</sup>近代著名学者岑仲勉先生也在《金石论丛》中说:“昔蔡中郎有言, 吾为人作碑多矣, 唯郭有道无愧词。李北海长于碑颂, 人奉金帛请其文, 前后受钅万计。汉唐两邕, 皆能志墓者, 而其言其行如是, 他可类推。”<sup>[2]</sup>上面提到的情况无疑是真实的, 在北朝碑志中也严重存在。但是, 碑志文字的顺情虚饰倘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正是当日社会心态之真实投影, 于此阿谀奉承之中转可见出其时人物之价值观与信仰取向, 故取单篇或为失实, 合集一处反能见出一个时代之人情事故。清代著名学者王昶在《金石萃编》卷三十九《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对北朝造像记的文字评价极低, 称其“鄙俚不经, 为吾儒所必斥”, 但接下来却说:

然其幸生畏死, 伤乱离而想太平, 迫于不得已, 而不暇计其妄诞者; 仁人君子阅此, 所当惻然念之, 不应遽为斥置也。<sup>[3]</sup>

这也正是本文所要秉持的基本方法和理念。

## 二、伪托冒袭与不讳出处

对祖先的崇敬以及由此连带产生的家族观念

在中国古代无疑是被高度强调的，以至于“对祖先的重视和对子嗣的关注，……成为中国思想在价值判断上的一个来源”。<sup>[4]</sup>而中古时期的中国社会正是门阀士族的全盛时代，出于维护自身特权的需要尤重门第的纯粹性，对于家族来源与郡望的强调不遗余力，以鲜卑族为代保的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时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上的取向，对此，他们的反应是复杂的。从心理上他们接受了强调祖先和族源所出这样一种价值判断标准，这可以从大量少数民族的墓志对此不厌其烦的描述中见出。但是，在具体的认定过程中，我们却发现了潜在的冲突。一方面，出现了大量少数民族出身者伪托中原名族冒引华夏名人为祖先的情况。如天平四年的《张满墓志》称志主张满为“字华原，南阳西鄂人也，汉相留侯之苗裔”，<sup>[5] 180</sup>但查《北齐书》本传却称其为“代郡人”，且传言张满“语通书革之国，言辨刻木之乡”，当为代人无疑，而其所冒之“南阳西鄂”正为当时张姓中最著之望。

不但一般的少数民族有冒袭的情况发生，北魏皇族元氏亦无例外。正光五年的《元宁墓志》即为一例。志称宁“字阿安，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唐尧之苗裔，汉高之胤胄，孝章帝之后”，<sup>[5] 98</sup>从其姓氏和里籍我们可以判断其为北魏宗室，但墓志却称其为“汉高之胤胄，孝章帝之后”，其为伪托冒袭自不待言。

此外，亦有自称出身北方朔漠但其祖先为自汉地外迁者。如宣政元年《独孤藏墓志》。志称藏：“字达磨，朔州人也。……本性刘，汉景帝之裔，赤眉之乱，流寓陇阴，因改为独孤氏。”<sup>[6] 295</sup>同一手法者，还有孝昌三年的《刘玉墓志》、<sup>[5] 126</sup>天和四年的《李贤墓志》<sup>[5] 259</sup>等。

但与此相对的，亦有相当的北方少数民族出身者并不讳其所出。如河清元年的《库狄迴洛墓志》。志称：“王讳洛，字迴洛，朔州部落人也。大酋长公之孙，小酋长公之子。……鸿源与带地均长，隆基与于天比美。石氏一门万石，杨家四世五公。

物论愧其勋朱，有识多其冠冕。”<sup>[5] 225</sup>则毫不以出身北方少数民族为耻，且认为其家族门第之盛并不亚于中原之汉族高门。有趣的是，其妻斛律昭男的墓志中也体现了同样的自信，志称：“郡君讳昭男，朔州怀朔人也。第一领民酋长、左光禄大夫、广汉公可知陵之女。赐性命氏，与日月而俱悬；冠冕蝉联，共沧波而并注。”<sup>[5] 226</sup>

从以上对族源、地望所出的不同选择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汉化的具体过程中认同与反抗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并存的状态。但就整体趋势而言，则认同的一面愈来愈占据优势。奚智、奚真父子两代的墓志即为这种趋势之绝佳写照。正始四年的《奚智墓志》称其为：“恒州樊氏人也，始与大魏同先，仆脰可汗之后裔。中古迁移，分领部众，遂因所居，改为达奚氏焉。逮皇业徙嵩，更新道制，敕姓奚氏。”<sup>[5] 40</sup>而至正光四年的《奚真墓志》则称其为“河阴中练里人也。其先盖肇倭轩辕，作蕃幽都”，<sup>[5] 90</sup>两代人心态之微妙变化正可看出随着时间的迁移，北方少数民族对于汉族及汉族文化的趋同度在不断提高。

### 三、“文”、“武”之间的徘徊

北方少数民族之能入主中原以至北魏最终统一北方地区其最大之凭藉为其强悍之武力，此亦为其民族性最显著之特点。但随着其进入中原地区，面对一个在政治、文化、经济以至人口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民族，想要维持统治的稳定，单靠武力之弹压与震慑已经不能达成目的，因此由“武”而“文”就不仅仅是心态上自信与否的问题，而亦是面对新的挑战必须作出的回应。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由北朝少数民族碑志材料的观察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形。

第一类是全然由“武”而“文”者，其中尤以元魏皇族为代表。如正始四年《元绪墓志》即称绪：“涉猎群书，遍爱诗礼。性宽密，好静素。”<sup>[5] 41</sup>延昌二年《元显墓志》称显：“日就月将，若望舒

荡魄；年成岁秀，若腾曦洁草。松邻竹侣，孰不仰叹矣。是则慕学之徒，无不欲轨其操，既成之儒，无不欲会其文，以为三益之良朋也。若乃载笑载言，则玄谈雅质。”<sup>[5] 50</sup>延昌三年《元颺墓志》亦称颺“雅度清简，倾衿慕道”，并进一步称赞他“高枕华轩之下，安情琴书之室，命贤友，赋篇章，引绿酒，奏清弦，追嵇阮以为俦，望异氏而同侣，古由今也，何以别诸”。<sup>[5] 54</sup>正光四年《元秀墓志》记述更为详细，志云：“好读书，爱文义，学该图纬，博观简牒，既精书易，尤善礼传，栖迟道艺之圃，游息儒术之藪；虽伯业不倦，宣光纵横，无以尚也。及垂纓延阁，握兰礼闕，科篆载辉，奏记彪炳；元瑜谢其翩翩，广微惭其多识。”<sup>[5] 84</sup>而天统元年《元洪敬墓志》则直接称志主“披书传，何欣弓马”，<sup>[6] 177</sup>则其民族之武力特质亦渐趋泯灭而汉化日深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少数民族妇女身上，孝昌二年《元瑛墓志》的志主元瑛是孝文皇帝的季女，志称其“披图问史，好学罔倦，该柱下之妙说，核七篇之幽旨，……綃黻风靡，斧藻川流，所著辞赋，有闻于世”，<sup>[6] 118</sup>虽不免虚饰的成分，但基本可以肯定志主是一个汉文化程度很高的妇女。而他的父亲孝文帝更是以文学见长，赵翼《廿二史劄记》“魏孝文帝文学”条即云：“帝深于文学，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讳者。”<sup>[7]</sup>

元氏皇族之外情形类似，如熙平元年《吐谷浑玁墓志》。志称吐谷浑玁“博畅群籍，志录经史，考合统理之明，杂袭殊晖，莫不施其所能。善文艺，爱琴书，系竹声席，超然独悟”。<sup>[5] 62</sup>

第二类为趋“文”而不废“武”者，这种情况在南北朝少数民族墓志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正始元年《元龙墓志》一方面称志主“早深漠北之志，少稟山西之风。……前无横阵，战必先登”，死后被朝廷谥为“武侯”，但同时又指出其“闲和有素，道术时钻”。<sup>[5] 37</sup>又正始二年《元始和墓志》称志主元始和：“秉文之举，才溢于杨向；执武之筹，谋腾于韩白。德可以范时，威足以摧敌”。<sup>[5] 38</sup>延昌三年《元珍墓志》称珍“少以忠

为称，长以风雅着仁，六艺备修，尤良射御”，后面的铭中则径称其：“猗矣哲人，秉文经武。”<sup>[5] 55</sup>当然这些被称赞者未必一定是文武兼长，但志文中这样的称赞至少说明当时少数民族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其既有武力特质的肯定，其真实心里正渐趋于“文”而不自觉矣。倒是天保六年的《奚泰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真实的历史情景，让我们能够一窥历史的真相。墓志称志主奚泰：“少以剑气有闻，长以侠烈标誉。力折鲁门，勇高齐垒。”后面紧接着写道：“历寻经史，不为章句之业，偏持《三略》、《六韬》，好览《穰苴》、《孙子》。”<sup>[5] 215</sup>如此，则这些坚持其民族武力特质者最初所接受的更多是经史致用之学，是《穰苴》、《孙子》这样的兵书战策，而不是“无用”的所谓“章句之业”，这因该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部分。

第三类则为坚持其民族之固有武力性质而不愿趋“文”者，这种情形在南北朝墓志中比较少见，但是其存在本身亦足以代表一部分少数民族之真实心态，尤其是在汉化已经相当深入的北朝后期。比较典型的是北齐河清三年的《狄湛墓志》，志称湛：“轻文好武，重义忘身。超乘击剑之能，类中希伴；麾戈骑射之伎，举世无俦。”<sup>[6] 172</sup>在后面的铭辞中则直接称赞狄氏“情钦剑侠，意忽儒生”，<sup>[6] 173</sup>则不愿趋“文”态度之明确不言而喻。有关这一点田余庆先生在他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鲜卑拓跋部的主体部分虽然已经以编户形式进入中原，在农业生活的基础上加速了与汉人的融合，但居于北面边疆地区更为落后的鲜卑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却仍然没有在较大程度上改变过去那种闭塞、孤独状态。他们在民族融合方面还有一段更长的曲折道路要走。”<sup>[8]</sup>这些少数坚持其民族武力特性而不愿趋“文”者更多的即来自这一群体，狄湛可以看作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总体而言，尽管由“文”而“武”的转化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充满了种种曲折和反复，但大的历史趋势却非常明显，孙同勋先生在《拓拔氏

的汉化》一书中有一组统计数字即很能说明问题。孙氏统计了北朝元氏历代悍将人数及所占全体宗室的百分比：<sup>[9]</sup>

帝号	太祖	太宗	世祖	高宗	显祖	高祖	高祖后
武将 %	54	51.5	61.5	47.2	38.7	26.7	38.0

上面的统计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观察出,除过世祖朝武将之人数略有比例上升之外,总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后推移元氏中武将所占宗室之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而这还只是北魏朝的情况,迟至北朝后期其由“武”而“文”的比例当会更高。

四、“忠”与“孝”的接纳与坚持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发现北朝少数民族墓志在对中原文化的态度上充满了矛盾与反复,在一定历史时期各种不同意见和态度是并存且相互斗争的,并未达成广泛的一致。但是,极为特殊的是在对待中原儒家文化两个重要概念,即“忠”、“孝”问题上北朝少数民族墓志却体现了高度的一致。如太和廿年《元桢墓志》称元桢:“爱在知命,孝性谿越,是使庶族归仁,帝宗攸式。”<sup>[5] 31</sup>孝性的“谿越”竟然可以使“庶族归仁,帝宗攸式”。虽是夸饰之辞,但其对“孝”的观念以及“孝”的功能的重视却是毫无疑问的。前举正始元年《元龙墓志》在历数志主的文武功业时,对于孝道亦不忘提及,元龙以丁母忧去职后,志称其“至性通神,哀感行路,岂唯致叹加人,故亦非扶不起”,<sup>[5] 37</sup>则完全是一个笃于孝道者的形象。又如延昌三年《元颺墓志》,志称元氏“恭孝之心,睦睦于韶年;忠亮之操,蹇蹇于弱岁”,<sup>[5] 54</sup>则直接以“忠”、“孝”对举。大成元年《尉迟运墓志》称运“资忠履孝,枕义藉仁”,<sup>[6] 304</sup>后面又再次称运“孝备求忠,行余方学”,<sup>[6] 306</sup>对于“忠”、

“孝”的认识完全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即一个人只有在家尽“孝”才有可能为国尽“忠”,“忠”与“孝”其实是一体之两面。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河清三年《狄湛墓志》,墓志一方面称志主“情钦剑侠,意忽儒生”,但是对于儒生、儒家所坚持的“忠”、“孝”之道墓志的作者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志称狄氏“忠孝尽于君亲,信诺存于朋友,……内外嗟叹,远迩歌咏”<sup>[6] 173</sup>,则未尝不以儒家的“忠孝”观来作标准,并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即使是那些顽强坚持其民族固有武力特质的少数民族他们也不能完全独立于“汉化”之外,只是程度的深浅、步骤的快慢有所不同而已,其大的趋势则是一致的。

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这与统治阶层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有意推行“忠孝”观念有关。在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中,对于汉族的固有文化其接受的方式和程度有很大不同。而“忠孝”的观念对于初步统一中原的鲜卑族而言无疑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强调和推行这种观念不仅有利于加强其民族内部的统一,而且对于减少民族之间尤其是少数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具积极意义。当整个社会不论胡汉开始强调一个人应该具备“忠孝”的品质而不涉及其族属问题时,则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无疑会有所减轻。

与此相联系,在北方少数民族妇女的墓志中我们也看到了对“三从四德”之类儒家伦理对妇女的道德要求的不遗余力的赞扬和强调。如景明四年《侯夫人墓志铭》,志文对这位贵族妇女的描述是“柔婉表于自然,静恭光于素里。入嫔紫闱,贞问踰芬。曜质椒墀,慎徽弥远。……含章之美,懋于早年;母德之风,志而方著”。<sup>[5] 35</sup>又正始四年《麴氏墓志》称麴氏“姿量外洞,贞丰内效,德比九亲,行征一国,五训俱备,礼染家人”,<sup>[5] 41</sup>很明显,志文所称赞的美德与汉族儒家观念之要求无异。前举孝昌二年《元瑛墓志》亦称元瑛“六行允备,四德无违。孝友出于自然,柔恭表于天

性。虽捥天为姝，生自深宫，至于箕幕制用，醴醕程品，非唯酌言往载，而率用过人”，<sup>[6] 118</sup>情形正自相同。

## 五、余 论

从对以上大量碑志材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经历了种种曲折与反复，而统治阶层在面对中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时也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其中，对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一般会欣然接受并不遗余力的加以推行。反之，如果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威胁到其民族之固有特性则态度便显得犹豫反复甚至是抵制。但是，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言，这种反复与抵制也可被视为其“汉化”进程中一种特殊之表现形式。北方少数民族在汉族文化与自身文化的不断比较和冲突中最终完成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为其后隋唐盛世的出

现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文化基础，其历史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M]//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第9卷) 唐白敏中碑.
- [2] 岑仲勉.金石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9.
- [3] 王 昶.金石萃编[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 39.
-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24.
- [5] 赵 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 [6] 罗 新,叶 纬.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7] 赵 翼.廿二史劄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308.
- [8]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07.
- [9] 孙同勋.拓拔氏的汉化[M].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 1962: 74.

(责任编辑：常建平)

## Check on Amalgamation of nationality through north-dynastepitaphs

WEI Hong-li

(The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 The amalgamation of nationality in mediaeval times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Chinese history. The fact that the amalgamation of nationality lasts three centuries shows that the amalgamation is very difficult. The paper reviews the amalgamation by many north-dynasty epitaphs and indicates that the minorities face a series of challenges and conflicts. Las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ough there were many challenges and conflicts, the amalgamation of nationality was accomplished, 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rrival of the prosperous period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Keywords:** epitaph ; north-dynasty ;Xanbei-race ;amalgamation